

论晚清中下层官员王拯的经世思想

张幸怡

(暨南大学, 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 道咸以降, 伴随内忧外患的加剧, 晚清士大夫的经世思潮经历了深刻嬗变。作为晚清中下层官员中的一员, 王拯的经世思想深受岭西地域务实学风与理学底色的双重影响; 面对严重的时代危机, 王拯在平叛经略及地方民生等层面皆提出了极具针对性的改革主张。受制于宏大叙事的研究路径影响, 类似于王拯般的晚清中下层官员的经世思想研究多处于失语状态, 对王拯经世思想的剖析, 不仅有助于立体复原晚清士大夫应对变局的多维面相, 也为理解晚清中下层官员群体“失语”的历史命运提供了重要的“切片”。

关键词: 中下层官员; 岭西五大家; 经世思想; 王拯

DOI: doi.org/10.70693/202609132286

一、绪论：时代危机下失语的多数

道咸同光之际, 大清帝国正置身于“三千余年一大变局”的惊涛骇浪中。外部, 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震碎了天朝上国的骄傲, 从两次鸦片战争的割地赔款, 再到中法、甲午一役的沉重打击, 古老帝国步履蹒跚; 内部, 太平天国之乱如燎原野火般重创东南半壁, 继之回捻起义此起彼伏, 不仅耗尽国库元气, 更导致了军政权力向地方督抚倾斜的“内轻外重”之局。

这一时期, 封建制度的腐朽与社会秩序的瓦解交织重叠, 晚清士大夫群体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思想裂变, 传统的“经世致用”之学由书斋阔论向救亡图存转变。然而, 长期以来, 学术界对晚清经世思想的考察多聚焦于曾国藩、李鸿章等握有实权的封疆大吏, 或魏源、龚自珍等开风气之先的思想先驱。那些身处官僚体系中层、虽无决断大权却对体制顽疾感触最深的“中下层官员”, 他们的政治主张与现实关怀往往淹没于宏大叙事的阴影之下, 成为近代史研究中“失语的多数”。

王拯(1815-1876), 字定甫, 广西马平人。在文学史上, 他与龙启瑞、彭昱尧等人并称“岭西五大家”, 并被视作桐城派在晚清地域文化中的重要传人。然而, 对于王拯本人而言, “文学”不仅是其承载圣贤之道的工具, 更围绕着清廷政治运作的轴心展开。王拯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进士, 历任翰林院编修、户部主事, 终官通政使, 并长期任军机章京。作为一名从岭西边陲走向京师的中下层官员, 王拯正处于帝国信息的交汇点与权力的边缘地带。其在京任职期间, 正值帝国最动荡的岁月, 他的身份使其既能通过台谏言路洞察官场积弊, 又因缺乏实权而对政策落地抱就焦虑不安。这种复杂情绪多隐藏在其文集与奏折中, 使其文学作品成为了晚清士大夫应对时代危机的共同呼声。

本研究的核心意图在于通过王拯这一典型个案, 剖析晚清中下层官员经世思想的独特面貌。作为一个权力并不显赫的官员, 王拯的经世主张有何异于“权臣”与“政论家”的底色? 他的岭西地域身份与理学底色如何体现在具体的吏治改革、平叛方略与民生对策的具体对策中? 更为重要的是, 本研究试图探讨王拯身上体现出的“权力边缘”与“经世热诚”间的矛盾冲突, 即当一个怀揣着“内圣外王”理想的士大夫, 面对因循守旧的官僚系统与不可逆转的时代颓势时, 他的建言与抗争到底有多大效用? 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经世困境, 又如何折射出晚清士大夫集体的历史命运呢?

二、王拯的思想源流

在传统的清代学术版图中, 广西长期处于边缘地位, 然而, 道咸年间广西基层社会的剧烈动荡, 尤其是多民族聚居区频发的土客械斗与轰然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 赋予了岭西士人一种天然的“边疆危机感”, 而王拯正是

作者简介: 张幸怡(2000—),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通讯作者: 张幸怡

成长于这样一个社会矛盾极度尖锐的后发地区。岭西长期的动荡使王拯锤炼出对时局敏锐地判断力,增长其直面乱局的实际阅历,这种始发于岭西边陲的危机意识,使王拯的经世思想从一开始就褪去了书生议政的虚浮,带有一种岭西人特有的硬朗与务实。这一特点也体现在其后来在京期间提出的吏职与兵略的锐利主张中。

王拯的思想演进,得益于他所置身的学术与政治网络。首先,是以王拯、龙启瑞、彭昱尧、朱琦与吕璜为核心的“岭西五大家”^[1]同乡网络。这不仅是一个文学流派,更是一个在京师互通声文、共论时政的政治共同体。他们在京城形成的“岭西交游网络”,通过诗文唱和、书信往来,组织寿欧会与顾祠会祭的等活动构成强烈的政治认同,使其在面对朝廷因循守旧的政治风气时,能够保持共同的经世的心态。

其次,入仕后王拯拜入梅曾亮门下,梅曾亮作为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的得意门生,亦继承了其经世致用的倾向。姚鼐崇尚“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合一,并强调研究即使需要引入考证的实证学风以补理学之短,也不能为了在学问细枝末节上追逐求索而舍弃根本的义理,丢弃治学的根本法则。因此,在姚鼐的影响下,梅曾亮的思想具有明显的“经世”面相。梅曾亮强调行文要“通时合变,不随俗为陈言者是已”^[2],把文章的社会功用作为评价学术的标准。作为梅门后进的王拯深受这一理念的影响,强调见之于行,其文章充满理学的实证实用色彩,亦在亦处处反映社会现实,如《拟上某尚书书》、《拟办粤西贼匪策》、《防堵四策》等文章直抒胸臆,针砭时弊字字有声,分析时事目光锐利。在王拯看来,学术的生命力不仅在于纸上的记诵,更在于应对现实政治利弊的实效。

最后,王拯与曾国藩等理学名臣的交往亦对其思想演进有一定影响。道光二十二年(1841),王拯在朱琦的引荐下与曾国藩结交,此后二人间的文学交流渐之增加,交情甚深。王拯将向来秘不示人的《龙壁山房文集》寄给曾国藩阅读,曾国藩也多次称赞王拯,不仅称其为“英年妙才”^[3],甚至在家书中向其兄弟介绍王拯,认为他是一名不甘庸碌的有志之士。不仅如此,王拯与大臣孙依言、林寿图与郭嵩焘等都是至交好友,他们的诗文往来与邀约唱和多如牛毛。因此,王拯虽处在官僚体系的中下层,却能够通过与国家高层的学术交游拓宽国家治理问题的视野。

对于王拯而言,古文创作并非消遣之作,而是其政治抱负的延伸。在《龙壁山房文集》中,大量的碑传、书后与论辩,实际上是王拯的政治呐喊。他的文章往往微言大义,借古讽今,直指当下吏治的因循与朝廷的积弊。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多次进犯台湾鸡笼海口,姚莹与达洪阿极力抵抗,用计谋将敌人斩击殆尽。谁曾想战后英方以“妄杀遭风难民”为由施压,清廷为求和谈顺遂,竟听信英方片面之词,将姚莹等抗英功臣革职查办。王拯得知此事后极度愤慨,毅然写下《拟上某尚书书》。他在文中疾呼,处理姚莹会使“四方守臣皆如姚莹之所愤切,断以为不足威也”,认为朝廷此举是“自毁其肺腑”,因“夫功勋者,为治之大纲”。清廷这一行为不仅寒了守边将士的心,更在大国交涉中丧失了国体。王拯此文,名为拟书,实为投枪,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晚清在对外战争失败后,清廷内部不仅没有激发起自强之心,反而陷入猜忌、推诿之中,整个官僚体系陷入了“坐畏战守之乏策,思蒙昧以苟安”^[4]的得过且过状态中。畸形的官场生态与紧迫的内外形式激起了王拯“文以载道”的自觉,使王拯在位卑权轻的困境下,依然能够通过文学作品发出深刻的经世呼声。

三、王拯经世思想的核心内涵

王拯为人刚正不阿,他的好友龙启瑞在写给王拯的送别诗中,曾用“士之能立名行,著风义节慨,取信于师友,不辱于乡党,寄之以万金之货而弗利,托之以六尺之孤而弗避,抑之至一介之贱而弗以为辱,爵之以三公之贵而弗以为荣,此其人必有确实自信之志,百折不回之气,艰忍决绝之行,激昂慷慨之心。”^[5]一句赞扬王拯的高尚德行。正因为拥有这种百折不回之气,王拯在步入政坛后,能以超越私利的胆识审视时局,其上书不仅持论公允,更具有有一种振聋发聩的力量。因此,王拯的经世思想并非泛泛而论,而是蕴含着极其深刻的现实关怀,并直指晚清社会弊病,成为了晚清政坛不平则鸣的清流。

王拯的经世思想深刻地体现在其兵略中。作为军机章京,王拯得以接触最新的军报,因此对各地的军情了如指掌,分析地方形势往往一针见血。作为身在京师的岭西官员,王拯对席卷家乡的匪乱有着比同僚更深刻的痛感,因此,其平叛方略也有着明显的地域关怀。从道光末年开,广西地区陷入了土匪纷起的局面,一直到同治年间才逐渐平息。面对家乡日益猖獗的匪情,王拯毅然写下《拟办粤西匪策》,提出了一整套完备的平叛方略。

首先文章开篇就揭露了地方官员“大抵覆匿,转相蒙蔽”导致贼势做大的地方潜规则。其次对于官兵们缺乏战斗意志,出现“兵威不振”,甚至“兵反畏贼”的情况,王拯主张必须实行严酷的军法,将领要有便宜行事、就地正法的权力,以此逼迫将士抱有“必死之心”,扭转前线官兵“侥幸一日之功”的苟且心理。另外王拯也留意到跨省调兵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水土不服、屡败屡战,于是他提出“征兵满万,不如招募数千”的论断,主张以重金在本地招募少而精的“壮勇”,由得力将领统帅,集中兵力专门打击最大、最凶恶的贼股。不仅如此,王拯认为贼匪之所以能够流窜坐大,是因为到处都能抢到粮食,并能裹挟百姓,因此他极力推崇以绅士和宗族为核

心的“乡团”制度，他认为乡团可以“坚壁清野”，让贼匪无从劫掠，无处藏身。对于那些因饥寒交迫被裹挟成为“土匪”的良民，他主张“善战莫若攻心”^[6]，必须把首恶与被胁迫的群众分开，只要被迫从贼的良民愿意回乡自首，一律给予自新机会，不予追究。王拯对匪情入木三分的分析，得益于其优秀的军事地理素养，他将广西分为了几个关键的战略节点，例如潯州为居中扼要的四达之区、南宁为左江重镇及梧州为接壤广东的咽喉。他主张利用地形进行分兵合击，以达事半功倍之效。

从王拯的这篇文章中，我们可见其经世思想的几个重要取向。首先王拯经世思想的核心之一是“求实”，其在文章开篇即直指广西乱局的根源并非由于贼强，而是在于吏治的虚伪与腐败，直言粤西匪患蔓延的根源是由于官府“招抚失当”。他痛陈地方官面对粤西匪患时的推诿与隐瞒，批判晚清官场中上下相瞞、讳疾忌医的风气。王拯认为，这种怀安苟且的心态一旦蔓延，官场内外就容易失去自强之心，导致“求和苟安”的短视之弊。若“其心盖不自强”则清王朝也只能如同周王朝一般，落得“周之天下亡於东迁之日也久矣。”^[7]的下场。因此，为政者必须面对现实，破除晚清官场那种只求表面平安、实则溃败不堪的因循之风，转而追求实效，方能凝聚民心，重振国威。

其次，王拯经世思想另一个重要核心是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在军队调动上，他意识到从云贵等省调拨的“客军”易水土不服，主张在本地“募精勇”替代“征兵”，利用本地人天然优势实现“以土治土”。同时，他巧妙地利用了天然存在的宗族纽带以组织“乡团”，形成民间抵抗匪乱的防御力量。另外，王拯敏锐地捕捉到匪乱内部复杂的构成与心理，明确地区分了“会党”与“良民”，并意识到一味地依赖暴力镇压只会将犹豫者推向敌对阵营，因此他主张顺应民众思乡、求生的本能，对会党发起釜底抽薪式的心理攻势。这种不逆势而为、反借势而归的治道之策，不仅体现出王拯经世思想中的民本思想，也体现出王拯对当时社会结构的演变有着极其深邃的洞察力。这种根据特殊社会情形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开出的“临床药方”，正是经世的实用性所在。

不仅如此，王拯的经世思想具有前瞻性。早在广西匪乱兴起之时，王拯便意识到了保甲团练的重要性，他不仅将团练看作是地方军事防御的辅助手段，更将其视为兵民一体、稳固邦本的基层治理体系。他注意到传统团练“临时募勇、事后解散”的局限性，主张对“团”与“练”进行划分，以“团”为基础，以本地丁壮为主体，对地方进行日常稽查，战时一呼而应守御乡土；“练”则为精锐丁壮组成，配给器械、专司作战，弥补团丁临时集结作战的不足，并且乡民也参与地区防卫中，如此一来便可规避传统团练集结易驱散难的缺点。针对粤西多地贫瘠、无力自办团练的现实，他主张官府倡捐及酌发官帑扶持，并制定“不敛钱、不抽丁、不调出境”^[8]的原则以减轻百姓负担，调动了地方积极性的同时也稳定了地方秩序。

不同于同时代一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剿匪主张，这种将军事防御与基层治理、匪情消解相结合的策略应对不仅有效地应对了当时粤西匪患的流窜问题，更预测到了晚清地方治理的新格局，即保甲与团练成为了咸丰朝清廷应对内忧外患的重要手段。至咸丰三年（1863），各地保甲推行卓有成效，伴随各地剿办太平军的形势日益紧张，各地陆续有督抚请求办理团练。其后曾国藩创办湘军、推行团练制度化，本质上正是对这一思路的继承与发展，因此王拯的前瞻性在后世应对内忧外患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印证。

四、中下层官员的经世困境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来有经世精神，在不同的时代，这种精神或隐或显，始终贯穿中国历朝历代。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困境唤醒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经世意识，桐城派学者也不例外。他们纷纷从故纸堆中走出来，将眼光投向政治、经济、现实并不断提出相应的救世方案，^[9]王拯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但是，作为一名中下层官员，他们经世的呐喊与呼声一般有限，在乱世的纷纷嚷嚷中往往容易被淹没，如同小石头投入无尽深渊般听不见回响。王拯的经世之路，自始至终都裹挟着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即使其每项主张都扎根现实，务实安民，却时常不予采纳，或未能施行，最终沦为时代洪流中的孤鸣。

咸丰元年（1851），洪秀全率拜上帝教会众在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起义军从金田出发，一路挥军直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广西永安，洪秀全借此机会实行永安建制。面对广西如此严峻的形势，清政府于二月二十二日命广州副都统乌兰泰带所制军械赴广州帮办军务。三月九日，又命大学士赛尚阿即赴广西接办钦差大臣事务，王拯以本部司员随行。王拯原因“窃于赛公平昔未有立谈之雅，徒以多言为人所推，又当时从行十余人中最为冗末”^[10]屡屡推辞，后在同乡与同僚的劝说下终以应允。军中条件艰苦，他与同僚只能蜗居于一“小耳房”，同僚“跼身于板”，自己只能“蜗曲于轿中”，饮食仅能“市米饭一盂，生而硬，强吞之，饮冷水一盂”^[11]。王拯本体弱多病，但为了国家社稷，为了粤西紧急的军情，他尽心配合同僚工作，力求“事无大小，悉蒙筹商”^[12]，为国家大事鞠躬尽瘁。

私下，其多与姚莹讨论军情，双方对当时正在粤西剿匪的向荣的多有批评，认为其为人虚伪，只因“夤缘左右，每次具禀，盛自夸张”^[13]，逐渐赢得赛尚阿的好感。实际上，姚莹与王拯深知向荣带领的军队“毫无纪律，

用于私斗”，对粤西紧急的军情根本毫无裨益。反观有勇有谋的乌兰泰，在永安被攻破的紧急情况下“兵行甚速，七战皆捷，贼锋几不可问”，却没能得到揆帅的真正赏识，反倒被小人的谗言迷惑，不得保荐。姚莹与王拯即便洞察军中积弊，直言将帅贤愚，但多次谏言亦无补于事，可见其人微言轻，真知灼见最终亦只能沦为满腔郁结。

咸丰十一年（1861）二月，鲁西爆发了一次农民起义，在这群起义军中，宋景诗是起义队伍中一支比较强劲的黑旗军的首领，但由于农民组织的松散以及军事目标的不明确，加之清军的武力压制，农民军未能跟捻军有效联动，最终在胜保的进攻下，宋景诗向清军投降。对于宋景诗的乞降，王拯始终对其保持着警惕的态度，多次请旨，认为“降贼叵测昭露，请旨密饬统兵大臣，迅即翦除，以消后患，而全大局”，并且敏锐察觉到由于“崇厚等为之一再，养痍裹挟”，导致宋景诗率领的队伍日益壮大，从“其党不过数百”，逐渐演变至“已逾万矣”，成为地方不可忽视的一支强劲队伍。不仅如此，宋景诗在昌邑、莘县、聊城、临清四州县的所有村庄树立旗号，勒令百姓将收获的麦子与佃户平分后运送到岗屯，当地百姓没有人敢违抗，王拯从他身上嗅到了叛变的危险气息，除了多次向朝廷上书外，还积极向关系较好的地方大员谏言。他在写给刘长佑的书信中多次让其提防宋景诗，有言其“首鼠情形如见……恐久成巨患，愈益难图”^[14]，希望刘长佑慎重谋划，及时铲除这一巨患。

王拯上奏后，清廷十分关注宋景诗动向，令僧格林沁、刘长佑、阎敬铭体察实际情况，妥善筹划办理，与此同时，僧王与军机处来往的公函中的对此事的商议也十分周详恳切。在与刘长佑的交流中，王拯对刘长佑的深谋远虑表示肯定，相信他定能“见微知远”而“谋定后动”，不会耽误剿匪时机。然而，王拯并未盼来他期盼的一天——奏折呈上后并没有被采纳施行，一方面是宋景诗本人摇摆不定的态度使当时负责围剿黑旗军的刘长佑举棋不定，另一方面是胜保的倒台以及清政府对待降部的强硬态度使得当时局面变化莫测，最终导致剿宋一再拖延。

同治二年（1863），宋景诗擅自带领部众返回山东，他这一行为随即引起的清政府的高度警惕，并将其视为宋反叛的信号。因此，同年五月末，清政府调集了大量兵力围剿宋景诗，谁料宋景诗应战后又再次向清廷乞降，既战又降，态度摇摆不定。至此，宋与清廷一直拉锯，直至同治十年，经英翰秘密派遣官兵，在亳州的界沟集一带抓获宋景诗。清廷下令在安徽就近处决宋景诗，并将其首级传送到他作乱的地方示众，以此彰显国家法度。宋景诗摇摆不定的态度以及清廷剿宋这一长时间的拉锯战，正正印证了当初王拯写给刘长佑信中“首鼠情形如见”、“恐久成巨患，愈益难图”的两个判断，若清廷在当初王拯上书之时重视其意见，敦促各路大臣时刻警惕宋景诗动态，就能及早发现如宋景诗一类摇摆不定的部将实则难以为己用，从而及早铲除，避免养虎为患。

由此可见，尽管王拯对时事的分析眼光独到，上书谏言字字珠玑，他的良策却因为种种考量甚少被清廷采用。其中既有国家面对复杂时事时需要综合形势与多方意见进行考量的因素，又有腐败的官场生态导致忠言逆耳甚至忠言不能进的现实成分，但最重要的原因，无非是人微而言轻。咸丰三年，王拯以户部主事一职兼军机章京，直至同治三年被参时也只是一名三品通政使司通政使。尽管他的建言常获得时人“持论公允”的美誉，然终因官阶低微，位卑言轻，其所言远没有曾国藩、李鸿章等封疆大臣般掷地有声，也并不像祁寯藻、翁同龢等高官般富有威望。因此，我们可以在王拯与他人的书信中多见其有志不能伸的忧郁与徘徊踌躇的归隐之意，这或许也是许多具有经世面相的中下层官员面临的共同困境。

五、结语

从开山之祖方苞推崇以程朱“义理”为核心的古文开始，桐城派就奠定了求实求真的思想面相。这种关注现实、讲求实效的思想倾向为桐城文人后来的经世转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道咸之际，国家陷入内忧外患之中，强烈的忧患意识使得桐城派文人急切地将经世致用的思想与桐城派古文结合起来以“经济世务”。作为桐城派的一员，王拯不仅受到了理学传统与经世思潮的影响，更因为岭西地区的独特面貌而使他的经世面相独具一格——其老辣的兵略常精准地预判形势，是乱世之中不可多得的明灯。但由于官阶的低微等其他原因，他的一些建言与谋略常常不被重视或被忽略，最终导致清廷在某些决策上痛失良机的例子并不鲜见，由此可见，具有经世面相的中下层官员仅依赖自身很难向上层传达自身的见解。因此，当我们在阅读王拯的文集时，除了可以看见其对社会形势的刻画分析及对官场腐败的激烈批判外，还能看见类似于“数年以来，颓废尽矣。性刚才拙，志意高而行不克敦”^[15]的感叹。这种嘘叹看似是他的自省，实则是他的自嘲，因为他只能用自己不够优秀、才学不够兼备以安慰自己为何有一番独特的见地却迟迟不受重用。

尽管此时王拯的思想具有经世转向，但作为传统官僚体系中的一份子，他的方针政策本质上都是对清廷现有的弊病提出相对应的政策，如推行保甲、发展团练等等，以维护地区的稳定，为清朝维护统治扫清障碍。因此也存在着天然的局限性——在工业革命来临已经到来之际，冷兵器时代中用长刀土炮组成的军队已经不是应对战争的最优解，洋人的枪炮、钢铁铸造的巨轮在战场上已屡屡占尽上风，朝野内外推行西学的呼声不绝于耳。因此，桐城派大部分文人对于政治与现实的关注也是在体制范围内的关注，这既是晚清桐城派得以“中兴”的一个原因，也成为了晚清桐城派被视为保守派的一个重要因素。^[16]纵观全文，我们可以感知桐城派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保守

派”，他们也有许多“因时而变”的主张，无奈的是，近代中国演变的速度超乎常人之想象，新旧思想交替之快令人咋舌，桐城派依托传统文统的调适与革新实际上难以跟上时代剧变的步伐，最终的结局注定是逐渐湮没在近代中国的激荡演变。

参考文献：

- [1] 张维. “岭西五大家”得名由来[J]. 阅读与写作, 2002, (5): 26-28.
- [2] 严云绶, 施立业, 江小角. 桐城派名家文集: 第13卷[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4: 434.
- [3] (清)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1: 135.
- [4] 严云绶, 施立业, 江小角. 桐城派名家文集: 第7卷[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4: 383-388.
- [5] 严云绶, 施立业, 江小角. 桐城派名家文集: 第7卷[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4: 69-70.
- [6] 严云绶, 施立业, 江小角. 桐城派名家文集: 第7卷[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4: 407-413.
- [7] 严云绶, 施立业, 江小角. 桐城派名家文集: 第7卷[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4: 410.
- [8] 严云绶, 施立业, 江小角. 桐城派名家文集: 第7卷[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4: 313-317.
- [9] 曾光光. 桐城派与晚清文化[M]. 合肥: 黄山书社, 2011: 2.
- [10] 严云绶, 施立业, 江小角. 桐城派名家文集: 第7卷[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4: 396-404.
- [11]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 《太平天国史料汇编》: 第十册[G].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8: 4483.
- [12]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 《太平天国史料汇编》: 第十册[G].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8: 4504.
- [13] 姚莹. 中复堂遗稿: 卷五[M]. 中复堂刻本. 安福: 姚濬昌, 1867: 18.
- [14] 周荣, 王新才等. 武汉大学图书馆馆藏晚清名臣手札: 第6卷[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24: 1129-1144.
- [15] 严云绶, 施立业, 江小角. 桐城派名家文集: 第7卷[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4: 394-395.
- [16] 曾光光. 桐城派与晚清文化[M]. 合肥: 黄山书社, 2011: 3.

The Statecraft Thought of Wang Zheng, a Mid-to-Low-Ranking Official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ZHANG Xingyi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Daoguang and Xianfeng reigns, the intensification of domestic turmoil and foreign aggression has driven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statecraft current among late-Qing scholar-officials. As a mid-to-low-ranking official of the period, Wang Zheng's statecraft thinking was doubly shaped by the pragmatic scholarly ethos of his native Lingxi region and the Neo-Confucian (Lixue) underpinning of his intellectual formation. Confronted with the grave crises of his age, Wang put forward sharply focused reform proposals in spheres ranging from counterinsurgency strategy to local people's livelihood. Owing to the long-standing dominance of grand-narrative approaches, scholarship on the statecraft thought of mid-to-low-ranking officials such as Wang has remained largely silenced. An analysis of Wang's statecraft thought not only contributes to a three-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responses of late-Qing scholar-officials to an age of upheaval, but also offers a significant analytical sample for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ical fate of "silence" that befell the broader stratum of mid-to-low-ranking officia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words: mid-to-low-ranking officials; Five Great Masters of Lingxi; statecraft thought; Wang Zheng